

# 《西夏地理研究》再评价

——与祁琛云商榷

张祖群<sup>1,2</sup>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070; 2.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学术界对杨蕤的博士论文及同名著作赞誉较高。针对祁琛云的批评意见, 文章试图从不同学科层面进行再评价, 主要涉及历史地理学的写法; 历史地理是否可以推断甚至是猜测; 多学科的综合运用, 该著作开创了西夏问题的研究先例; 该著作作为西夏的历史地图绘制打下坚实基础; 勾勒宋夏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民族格局; 深入探讨了西夏农牧业交错分布; 重新探讨了西夏灭亡的有关史实等七个方面。文章最后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西夏学; 历史地理; 《西夏地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34(2012)04-0073-06

## Revaluation of *The Studies of Xixia Geography*

—A Reply to Qi Chenyun

ZHANG Zu-qun<sup>1,2</sup>

(1.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Yang Ru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Studies of Xixia Geography* and his seminal work of that name have won high reputa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view of Qi Chenyun's critic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evaluate this work from the viewpoint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comments on the work mainly involve the following seven aspects: the writing styl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whether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can be inferred or even supposed; its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multi-disciplines and pioneering research of Xixia regime; laying a sound foundation for the historical mapping of Xixia; revealing the situation concerning the ethnic groups in northwest area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Song Dynasty and Xixia;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Xixia; reexamining the facts of the collapse of Xixia regime. The paper also draws some conclusions of the whole study.

**Key words:** Xixiaology;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Studies of Xixia Geography*

## 一、研究背景

近年以来国内西夏学著作应该如何客观述评? 特别是如何看待杨蕤的博士论文及同名著作《西夏

收稿日期: 2012-06-1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ZH084);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项目(PHR2011083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GL049);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BG125YB012)

作者简介: 张祖群(1980—), 男, 湖北应城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博士后。

地理研究》?杨蕤博士2005年6月博士答辩的论文《边疆历史地理学的探索:西夏地理研究》,经过修改以后以《西夏地理研究》专著在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出版。祁琛云对《西夏地理研究》评介中,赞誉几点(资料翔实,论据充分;方法灵活,论证严谨;不囿成说,多有创新),笔者表示赞同。除去这几点,祁琛云也提出两点批评意见:第一,“对西夏境内民族的分布、西夏的军事地理、人口地理、西夏境内外交通状况等问题涉及不多”。第二,“一些涉及西夏疆界四至、气候状况、植被分布等具体问题的结论仅仅停留在推断甚至是猜测的层面,并未做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有资料的不足导致的”<sup>[1]</sup>。笔者在这里不是刻意维护杨蕤博士之《西夏地理研究》,而是从不同学科层面对这几点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见。

## 二、研究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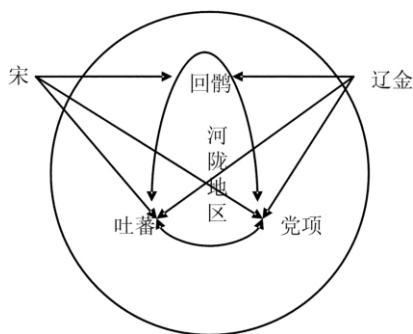
第一,历史地理学的写法。“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学科。”<sup>[2]</sup>历史地理学的核心是树立人地互动观念和尽全时空观念<sup>[3]</sup>。一般来说,历史地理学的写法有两种:第一种,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乃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的本身,多按其研究对象、内容属性而分成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类,并且单纯以地貌、气候、动植物、水文等自然要素,或者以民族、军事、人口、交通等要素作为某一个区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这样构成历史地貌地理、历史气候地理、历史动植物地理、历史水文地理、历史民族地理,或者历史军事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商业地理等;另一写法是以区域为对象,界定一个历史时期,做主要要素的问题分析,如鲁西奇教授以博士论文修改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sup>[4]</sup>,侯仁之先生1949年夏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北京历史地理》<sup>[5]</sup>。无疑,杨蕤博士论文属于后者,我们从他提供的第一稿与葛剑雄先生讨论大纲(合计八章)对比现在书稿的目录(五章,另加绪论、结语)可以看出,作者选取西夏疆域、《天盛律令》反映的西夏政区、西夏自然地理(气候、生态与植被)、西夏经济区等几个重点进行突破的可贵探索。这当然不能够包含西夏地理的所有历史性要素,当然也没有必要在博士论文中寻求大而全地讨论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地理。

第二,历史地理是否可以推断甚至是猜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其中第六册里宋·辽·金时期几幅历史地图基本复原了当时宋、辽、金对峙时期的态势和地理面貌<sup>[6]</sup>,代表了198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历史地理学是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地理学者更应关注在复原基础上的“构想”<sup>[7]</sup>。涉及西夏疆界四至、气候状况、植被分布等具体问题恰恰是西夏学非常困难的问题。限于资料的不足,必须依据一份史料说一分话,证实一点就是一点,不能证实的只能是推断或猜测。即使是推断的,有其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是谬误的地方,或者是猜测的多种可能性,也为后来者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提供了基础,学术就是这么积累的,这恰恰是目前人文社科学术探索中需要提倡的!笔者认为祁琛云先生的这一点批评其实是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以、不允许推断甚至是猜测,显得严重了!祁琛云先生判断这几个问题“并未做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有资料的不足导致的”,甚至与他前说“通过作者多方搜罗,原本薄弱的资料变得相当充实,足以支撑对西夏地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相矛盾。

第三,多学科的综合运用,该著作开创了西夏问题的研究先例。杨蕤博士的考古学本科背景(1993—1997年西北大学考古学本科)和宁夏考古研究所的工作经历,为他将考古资料运用到书本文献的考证中,并得出可信结论奠定基础。比如作者依据南华山(天都山)发现的千年古树根,其测定年代距今1000多年来判断西夏时期屈吴山中段(天都山一带)广布林木<sup>[8]293,334</sup>。而今天都山一带不再为密林,呈现灌丛草原兼少量疏林,古今植被变迁何等巨大!杨著文后的参考文献有许多西夏的考古资料,其也为学术界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贵的线索。

第四,该著作作为西夏的历史地图绘制打下坚实基础。关于西夏的疆域考证,传统的沿革地理主要依据清代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记载的“东尽黄河,西界玉门(今甘肃敦煌西小方盘城),南接萧关(今甘肃敦煌西小方盘城),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杨蕤博士发挥其历史地理学优势,不以固定、僵化和静止的

历史思维来理解西夏疆域,而是运用动态的、变化的观点,以大量可靠史料为证据,来梳理西夏与周边邻国的陆地边界,为西夏的历史地图绘制打下坚实基础。正如葛剑雄先生在给《西夏地理研究》的序言中所写道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不会是他的最终成果,西夏历史地图有望画得更加充实和准确”<sup>[8]3</sup>。宋夏之间疆界呈现三种阶段变化:西夏建国初期的宋夏疆界(1038—1067)、宋神宗亲政与“元祐分疆”(1067—1093)、“绍圣罢议”与北宋对西夏疆土的进一步蚕食(1094—1127),也即伴随着宋夏政治关系的冷暖,两国疆界在陕北衡山山脉与延州和镇戎军之间500公里范围内摆动<sup>[8]24—69</sup>。杨蕤将夏辽之间疆界分东段疆界(辽招讨司,阴山及其以东)、西段疆界(西夏与辽上京道接壤部分)两部分处理;将夏金疆界分东北缘、南缘两部分处理,而且夏金南缘随着夏金政治关系起伏波动很大;将西夏的西缘疆界分解为沙州及沙州回鹘、伊州问题两部分处理,探讨西夏、回鹘、于阗等角逐河西走廊西端的瓜洲、沙州,还有今新疆东部的伊州,伸缩极其明显。西夏极盛时辖地二十二州,包括今宁夏及陕西北部、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1 宋夏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民族格局(根据杨蕤,2008)

第五,勾勒宋夏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民族格局。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sup>[9]</sup>。杨蕤博士在《西夏地理研究》中精辟地分析了11—12世纪的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的角逐。“吐蕃、党项、回鹘三足而立的局面是整个宋夏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民族格局的主流和核心”,这是第一结构圈;而宋、辽、金、吐蕃、回鹘、党项这六支力量构成第二结构圈。两个结构圈层都是以河陇地区为核心进行较量和政治角逐。当时的中国河陇地区呈现出一派群英争雄的局面:分布有回鹘、吐蕃、党项、达怛、契丹等民族,并建立唃廝囉、西夏、沙州回鹘、甘州回鹘等政权,民族关系因此纷繁复杂。为此,他早在七年前也就是尚未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总结了宋夏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民族格局图<sup>[8]345—346</sup>,<sup>[10]</sup>。需要更正媒体上的一个说法是:当时在中华大地上由党项族占统治地位的西夏与宋、辽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西夏王朝始建于1038年,历经10代君主,于1227年灭亡,前后近两个世纪。大约西夏历史时期前后,在中国范围内,同时存在着宋、辽、五代十国、西夏、沙州归义军、大理、吐蕃、西州回鹘、黄头回鹘、于阗、黑汗(喀喇汗)和以后的金、西辽、蒙古等政权。其中,前期北宋与辽,后期南宋与金对峙是各个政权之间斗争的焦点,最后都统归于元朝。辽、西夏、金的战争、贸易、通婚、汉化与认同,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使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与发展<sup>[11]</sup>。

第六,深入探讨了西夏农牧业交错分布。西夏位于祖国西北一隅,其境内干燥寒冷的气候、草原荒漠的植被、多向布列的高山、水资源相对丰富的绿洲,规定并制约着其农牧业地域结构与空间分布。这种自然规定性与其境内多游牧民族栖息的结果,使牧业区域广袤,牧业人口较多。与此相应,农业区域相对集中于呈带状的、窄长的冲积平原上,耕作粗放而且农作物单位产量不高,人均占有粮食少,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不大。差异如此巨大的地理环境与农牧业经济方式结构,直接影响着西夏王朝的经济能力,

及在当时割据格局中的地位。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民众生产生活方式,既不同于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民族的采集与狩猎,亦不同于一些草原地区因气候和灌溉等因素的限制,农耕难以开展而选择的纯游牧业,更不同于古代中国腹地传统“跣足型”的纯种植业,而是农牧并存以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sup>①</sup>。西夏农牧业的空间分布,是其地理环境的规定与境内民族选择的结果。这个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政权,特别重视畜牧业,在其建国初期尤为如此。而其境内又居住着农耕民族,存在着宜农地带,这就使农牧业的地域分布相互交错,而且牧重农轻,比例不合理。从而阻碍了西夏内部农牧业两大部类的生产彼此交换和互补。结果是畜产品“剩余”,农产品“不足”。因此不得不尽力寻求对外交换的途径。西夏经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依赖性以及西夏国家对外战争和外交行为皆由此而起,并受到其经济条件的制约<sup>②</sup>。以文物建筑为例,处于夹缝之中的西夏吸取宋、吐蕃等优秀文化成果,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例如彭向前(2007)考证了西夏陵区北端的建筑遗址既非王室祖庙,也不是仅与西夏陵有关的佛寺,而是西夏统治者模仿宋朝寺院布局,同时吸取吐蕃民族“佛、祖合一”的思想,安放有西夏帝后神御的佛寺圣容寺<sup>[12]</sup>。

第七,重新探讨了西夏灭亡的有关史实。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地理角度看,成吉思汗对西夏的五次征伐,可以说采取过两个主攻方向,一是越过乌兰布和沙漠,通过今磴口(内蒙古西部河套平原源头,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巴彦淖尔市西南部)一段开阔地,再沿黄河而南,去攻击西夏首都中兴府(今银川市);一是沿今额济纳河南下,夺取龙首山北的兀刺海城,再东越今之腾格里沙漠,直扑应理(今中卫)、灵州,从南攻击西夏首都<sup>[18]</sup>。前者主攻,后者包抄,两路逼死西夏。从现存古迹看,今黑城(即黑水城)之北并无其他古城遗址,然则兀刺海竟会在黑城之北何地?王北辰先生最后认为《元史·地理志》关于兀刺海城位置的记载是混乱的、错误的,但是没有明确考证兀刺海城之具体位置<sup>[13]</sup>。李并成先生在《敦煌学》国家精品课程中认为兀刺海城在今山丹北。从历史典籍记载来看,成吉思汗的对外用兵,首当其冲是西夏。其对西夏用兵,它的起因—过程—最后征服,史籍记载甚少,且多有牴牾之处。在所见的古籍中,最早记载这一战事的,当推公元1240年在蒙古草原撰写出来的《元朝秘史》(也称《蒙古秘史》下文简称《秘史》),其次是波斯史家拉施特在14世纪初完成的《史集》,再次是公元1344年完成的《金史》、1345年完成的《宋史》以及虽没有成书年代但可推断是元朝初期成书的《皇元圣武亲征录》,最后是公元1369年成书的《元史》<sup>[14]</sup>。笔者认为,岑仲勉先生考证的“兀刺海位于黄河西北岸,即阴山西面的一个山隘口(高阙)<sup>[15]</sup>”,同样美国学者R·邓尼尔认为黑水镇燕军司设在兀刺海,而兀刺海位于河套北之狼山山口<sup>[13]</sup>,这较为可信。灭亡之后,西夏后裔去哪里了呢?唐荣尧在《王族的背影——追寻西夏后裔逃亡之路》中认为明末农民起义将领李自成、现代作家丁玲皆为西夏党项贵族的后裔,四川省北部北川、汶川、理县、马尔康等有大量西夏后裔的观点还需要进一步证实<sup>[17]</sup>。

### 三、总结和展望

近年以来国内西夏学研究既取得巨大研究成果,同时也有缺憾。成绩体现在发表文献多元化、研究多学科化、散点化等方面,缺憾是国内外西夏文献搜集整理利用还不够,还缺少对西夏单独一个点的深入研究<sup>[18]</sup>。从这两方面来说,杨蕤博士论文及同名著作可能是一个新的高峰。该著作在西夏时空边界的复原探索上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为后来者不论从学术层面还是大众层面进一步深入研究西夏问题打下坚实基础。

(1) 期望学术界对全球范围内西夏史料进一步搜集和深入整理,实现学术共享。史学界、考古学界是研究西夏学的主力军,依赖新材料的发现和竭泽而渔的梳理、考证,几乎成为传统国学介入西夏研究领域的重要途径。敦煌藏经洞、武威天梯山石窟、宁夏灵武、内蒙古自治区黑水城等都出土西夏文献。

① 见宁夏大学专门史硕士论文,李新贵之《西夏地理环境与农牧业经济研究》。

② 同上。

国内收藏西夏文献散见各个单位,国外收藏的西夏文古籍大致为:现藏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俄国柯兹洛夫在黑水城所获西夏古籍;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在黑水城所得西夏古籍;现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的大谷探险队所获西夏古籍;此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也有一些收藏。“俄罗斯收藏了中国95%的西夏文物,而其他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总和也超不过5%。”<sup>[19]</sup>国外最为全面的西夏古籍学著作首推俄国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的《西夏国家的书籍事业》,而目录著作则以俄国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最为著名<sup>[20]</sup>。其中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等的西夏学文献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对象。

国外这些博物馆所藏的西夏文献等大多是非法“考古”或者掠夺所得。例如1908—1909年,俄罗斯海军中校柯兹洛夫(Козлов П. К.)到中国西部“探险”。他以所谓“地理考察”为名义,前后两次进行了疯狂的挖掘,在黑水古城劫走大量珍贵西夏文物(包括佛像、法器、书籍、簿册、钱币、首饰等),最后,连夜打包运往俄罗斯。这些书面文献和器物现在分藏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和苏联爱密塔什博物馆<sup>[21]</sup>。在俄罗斯艾米塔博物馆收藏的西夏艺术品包括绘画、雕塑、版画、唐卡、考古书材料在内共3500余件,绘画270余件,均收藏在博物馆东方馆的中国馆内。国内学术界对国外这些西夏文献利用远远不够,因此些许发现或者仅仅是文献对照都会产生重要学术成果。例如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多部不见于现存各种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佛经,以及西夏和元朝时期翻译、流通的藏传密教仪轨手写本,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sup>[22]</sup>。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过去完全被人忽略的藏传密教文献,将其与回鹘、西夏、蒙古文中的佛教文献相比较,则可重构11—14世纪西域佛教史。孙颖新(2012)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大乘无量寿经》残卷进行了翻译和校注,指出西夏本与现存两种汉译本均有差异,其所据藏文底本可能略有不同,这引起学术界很大兴趣<sup>[23]</sup>。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合作的11册大型文献丛书《俄藏黑水城文献》<sup>①</sup>、英国国家图书馆编的四册《英藏黑水城文献》<sup>②</sup>以及宁夏社会科学院编李范文先生主编的四册《中国藏西夏文献》<sup>③</sup>的出版,各种罕见的外交、政治困难正在被克服,这种共享出版的努力正在逐步变成现实。当务之急是国家层面出面协调,由国内西夏学术界主导,将俄国军官柯兹洛夫和英国人斯坦因等从中国境内运出的西夏文物、典籍影印回来,将散见在世界各地的西夏文献校勘统一出版,尽快与国内西夏文献对接,形成一个全世界关于西夏学学术共享的数字化研究平台。各国共享古籍资源,共同为西夏学、丝绸之路研究、欧亚大陆民族研究进行深入的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正是在此基础上,2011年陕西师范大学韩小忙教授领衔的《黑水城西夏文文献整理与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资助。有望最近几年在海内外散见的黑水城西夏文文献整理基础上,多学科介入,深入探讨学术疑难,取得一大批研究成果。

(2) 期望对某一个典型村庄或城镇进行多学科的切入和综合研究 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本是给高等学校学生作课外读物,给中等学校教师作教学参考用书,其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sup>[24]</sup>、商务印书馆<sup>[25]</sup>等多次再版,该书在史料搜集的方面尤其花功夫,实则是有志钻研西夏历史的读者必读著作。上

① 《俄藏黑水城文献》按《汉文部分》(1—6册)、《西夏文世俗部分》(7—11)、《西夏文世俗社会文书部分》(12—14)、《西夏文佛教部分》(15—24)三大块出版,史金波等主编,(俄)孟列夫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第2册、第3册)1996年12月第1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第5册)1997年8月第1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2000年12月第1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7册、第9册)1997年8月第1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册)1998年12月第1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1999年9月第1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1999年10月第1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册、第13册、第14册)2006年12月第1版。

② 分别参见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2005年4月第1版,《英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2005年12月第1版,《英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第4册)2005年8月第1版。

③ 分别参见宁夏社会科学院编李范文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第1册)2005年8月第1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第2册、第3册)2005年12月第1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第4册)2006年4月第1版。

海人民出版社所出《中国断代史系列》中有一本《辽金西夏史》<sup>[26]</sup>。该系列的著者李锡厚、白滨是治宋—西夏断代史的学术大家。兰州大学历史系李蔚先生以发表的20余篇西夏方面文章为基础,在给学生讲课过程里编出了西夏史讲义,进而改编成《简明西夏史》著作<sup>[27]</sup>,曾经惠及一代学人。但是这种断代史性质的研究最大的弊端就是不能够从微观视野对具体西夏区域进行“解麻雀”式研究。如果能够识别历史上西夏王朝一个典型村庄或城镇,在资料充分与允许、文化变迁典型的前提下,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旅游管理学、历史文献学、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地质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区域经济学等多学科学者共同研究一个点,各个研究机构、高校合力攻关,打破民族、地域、机构、学科等界限,从不同视角探讨,互相启发,深入“解剖麻雀”,或许有更大的成果。比较值得一提的是《王族的背影——追寻西夏后裔逃亡之路》,该书是中国第一行走记者、西夏学研究者唐荣尧在2008年推出的最新力作。作者集记者、考证者、行者“三者”身份为一体,视野独特。该书以银川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做辐射状深入考察,对西夏后裔逃亡或隐遁的线路进行了追寻,对途经省份和西夏有关的一些重点地方,从经济、文化、地理、旅游和人文历史等方面进行了细致描述<sup>[22]</sup>。期望以西夏所管辖区域内田野调查为基调的个案,小区域、小空间等“微观史学”介入,在农牧交错生产方式、社会运作、国家管理、历史断裂与区域社会文化变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民族文化遗产与保护等方面,会有新的研究突破。

#### 参考文献:

- [1] 祁琛云. 西夏地理研究评介[J]. 地理学报, 2010, (2): 256.
- [2] 林 颖. 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 [3] 蓝 勇. 中国历史地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19—28.
- [4] 鲁西奇.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 [5] 侯仁之. 我从燕京大学来[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395—604.
- [6]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 [7] 阚维民. 历史地理学的观念: 叙述、复原、构想[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 12.
- [8] 杨 蕤. 西夏地理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293, 334.
- [9] 葛兆光. 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J]. 文史哲, 2004, (1): 5—12.
- [10] 杨 蕤, 冯璐璐. 宋夏时期河陇地区民族关系格局简论[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3): 38—43.
- [11] 刘正寅. 试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与发展[J]. 民族研究, 2000, (6): 68—76.
- [12] 彭向前. 再论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的性质[J].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7, (1): 115—118.
- [13] 王北辰. 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地理考[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1988, (6): 50—53.
- [14] 陶 刚. 成吉思汗五伐西夏考[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 (2): 44—48, 56.
- [15] 中国分省地图集(精装 16 开本)[M]. 北京: 地图出版社, 1974: 21.
- [16] (美)R·邓尼尔, 罗矛昆. 兀刺海(斡罗孩)和西夏黑水镇燕军司[J]. 宁夏社会科学, 1986, (6): 68—71.
- [17] 唐荣尧. 王族的背影——追寻西夏后裔逃亡之路[M].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2008.
- [18] 张祖群. 近年来我国西夏学研究述评与展望[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 82—89.
- [19] 冯元春. 西夏文物 95% 在俄罗斯[N]. 银川晚报, 2008—11—12(C4).
- [20] 包和平, 包爱梅.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收藏与研究现状[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4, (6): 9—14.
- [21] 黄振华. 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1978, (2): 311—323.
- [22] 沈卫荣. 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J]. 历史研究, 2006, (5): 23—34.
- [23] 孙颖新. 西夏文《大乘无量寿经》考释[J]. 宁夏社会科学, 2012, (1): 87—94.
- [24] 吴天墀. 西夏史稿[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25] 吴天墀. 西夏史稿[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26] 李锡厚, 白 滨. 辽金西夏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27] 李 蔚. 简明西夏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